

专业队中的种种“不理想”让年轻人重新寻梦,新兴市场挑战与机遇并存——

90后拳手的职业拳击梦是否无处安放

本报记者 梁璇
实习生 李伊涵

再次站上拳台的两周后,彭定贵先后接到了北京及宁波两家拳击俱乐部的邀请,“他们是新成立的,希望我去打比赛。”今天,电话那头21岁贵州拳击手彭定贵的言语十分兴奋,因为两周前,他咧着一口渗血的牙,吐字含糊不清但语气坚定的那句话有可能成为现实:“今天是我业余拳击(生涯)的结束,或许是我职业拳击的开始。”

“被发现”,是退役4年间,这个年轻选手时常做的“白日梦”。直到在北京参加国际赛事“全力巅峰3”后,阔别已久的拳台才让他又“燃”了起来,尽管上台前,他的目标就是别被KO,但3个回合后,他还是草草告别了自己第一个职业拳台。“很可笑吧?”他再三重复着这句话,因为从13岁进入专业队并成为“邹市明的师弟”后,他还是第一次“知道职业拳击的拳套那么薄,比赛能有那么多人看”。赛后,他甚至拒绝剪去手上渗满汗水和血水的缠手布,只透过嘈杂的背景音乐喊了一句,“我想多感受一下职业拳击的氛围。”

彭定贵这种年轻拳手对拳击的“热血”,正是盛力世家总裁李胜决心打造“中国职业拳手生存平台”的原因,从帮助邹市明、杨连慧等拳手在职业拳坛攀升后,他意识到,拳击在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打造让年轻拳手增长经验的比赛,以在“全力巅峰3”前进行的“全力之战”为例,“都是具备职业拳击的基础和潜力,但没有职业战绩的拳手,希望今后能让他们脱离零战绩,获得WBO的认证及排名。”

寻求公平的个性选择

“第一个动作面对台下,第二个动作面对台下对峙架势。”在赛前的称重仪式上,主持人一再用语言化解着台上拳手不知所措的尴尬,对于很多像彭定贵一样抱着“圆梦”态度来战的年轻拳手而言,比赛并不陌生,但职业比赛前再平常不过的称重仪式,却是多年拳击生涯里从未有过的经验。而在他们中,很多都是在全运会、世锦赛甚至奥运会上取得过好成绩的优秀选手。

同样出生于1994年的新疆拳手祖力皮卡尔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职业首秀是第5回合TKO(技术性击倒)对手完美结束。但他让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出拳勇猛外,还有“我跟我爸用3个月设计”的闪着亮片的白色战衣,以及被他像桂冠一样郑重戴上的八角帽,他向四周看台鞠躬,场内的掌声和欢呼持续不断,虽然此前获

得过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的亚军,但这样的氛围对他来说,却是十分新鲜,“打职业赛后,感觉业余比赛越来越有意思,而且那个赛场很多时候并不公平。”

比祖力皮卡尔年长一岁的杨森,正是因为不公平,结束了近9年的业余拳击生涯。13岁,为了练拳击,杨森离开山东德州老家进入某专业队,“没有寒暑假,每天过着操场、训练房、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只是为了好好训练取得荣誉。”在他看来,“拳击是很公平的项目,实力不够,老爸再有钱,该挨打的还是挨打。”直到2012年,在被他视作“目前人生中最大”的一项国际邀请赛上,出场前,他被“做了工作”,“说有很多原因,对方必须得到铜牌。”杨森怀着一丝不甘上场打到最后,结果“以一点之差”被判负,杨森才真正“对自己的团队感到失望。出现偏判后,我爹也不想让我再练了。”

退役后,杨森成为一名特警,开始了“开车上班,下班健身,别人眼中比较爽”的生活,但他却总觉得生活中少了一些激情,“我的梦想还是打拳击”,在教练的推荐下,杨森又悄悄登上拳台,“先打打试试,毕竟只知道现在职业拳击发展好,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希望这次能走得远一些。”

从专业队退役,在职业拳馆成长以及进入专业队后发现自己的打法更适合职业拳击的拳手,让职业拳击的“人才库足以支撑到下一个拳王出现。”李胜表示,目前,大多数年轻拳手来源于前两个渠道,“报名‘全力之战’的有100多人,比赛有点儿倒不过来了。”

市场风险与诱惑并存

“比赛不公平、训练不科学导致陈旧性损伤,没人关注。”这是很多年轻拳手离开专业队的理由,也被田野称作“非正常退役”。不同于老一辈运动员,90后的年轻拳手不仅在专业队“不理想”的情况下有更多离开的勇气,中国拳击市场的悄然兴起,也让他们无处安放的拳击梦有了着落。

“市场接得住。”杨森的教练田野曾离开拳击行业许久,直到近几年,随着“矿工拳王”熊朝忠的出现、邹市明转业日渐成熟、拳击俱乐部和赛事公司越来越多,田野才感觉到“是时候了”。他以正规职业赛的数据佐证市场的发展,“2012年约有三四场,2013年有七八场,以50%的速度增长,近两年发展更显著。”而专业的拳击俱乐部,“也有五六家小的刚刚起来,未来能打破成威、鹰图腾长期的强势。”

在田野看来,中国职业拳击刚刚起步,“没几个人能从中赚钱,就希望把市



4月24日晚,拳力争霸之“拳力巅峰3”在北京举行,中国选手曲鹏在比赛中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戴恩·坎贝尔,获得获得WBO轻量级中国金腰带。安灵均/摄

场做大”。而刚启动的市场,对于年轻拳手来说正是最好的机会,“对有潜力的人是阳光道,如果把他们扔到职业化特别成熟的美国,他们根本没机会。”

通常,成熟市场下的职业拳赛收入主要依靠门票、电视转播和赞助,“但在国内,一切恰好相反。”李胜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收费电视目前在国内基本无望,门票亦是杯水车薪,赞助则是支撑国内职业拳击的唯一来源。”而这种产业链并未完全成型的市场,对年轻拳手而言,机遇之外,挑战同样清晰。

“普通拳手参加4回合比赛,出场费3000元~5000元,6回合5000元到1万元;有头衔的3万~5万元。”田野介绍,目前国内打职业赛的拳手出场费普遍不高,且僧多粥少,“90%的拳手同级别比赛一年不到10场”,尽管“这比3年前回报多多了”,但对于习惯了专业队全方位保障的不少运动员而言,依然考验着勇气。彭定贵的态度具有代表性,“我不会主动去找,因为不想放弃现有的事业,但我期待被发现。”“十几二十岁的年轻拳手,在队里练

得不理想,想转职业,说明他们要进行自我规划。从队里退役后,生活训练经费的问题很难解决,出去找工作,训练时间、水平又无法保障。但被发现,资质好的选手可能会获得俱乐部的一些支持。”在昆明经营职业拳击俱乐部的李建伟表示,“90%的拳手都希望打职业赛,但很多孩子会因为专业队的安置和工资等问题而犹豫,若加上对市场的茫然,走出来也不容易。”

来自内蒙古的曲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现在被业内人士视为“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他,当年由于“年龄偏大”,被内蒙古拳击队放弃,但他仍以一份在酒吧当保安的工作维持着职业拳击的梦想,“每星期有6天到酒吧兼职,工作时间从每晚7点到凌晨4点,下班后稍事休息,下午3点又要到拳馆训练。”多年努力下,他以一场“让人来不及反应”的比赛拿下自己的第一个头衔,第一回合的2分34秒,眼见曲鹏拳手快,对手澳大利亚拳手戴恩·坎贝尔的教练,在第一回合铃声还未敲响前便扔出白毛巾,曲鹏获得WBO轻量级中国金腰带。

但令人唏嘘的是,这条预设6回合、被冠上“中国”的金腰带,在赛后引发了质疑。据李胜介绍,这是WBO为中国推出的金腰带,“在规则中是他们的发展腰带,是一种地区性的鼓励,为帮助更多年轻拳手增加信心,在职业发展上有台阶往上走。”可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是金腰带起码就要10个回合,人人平等,世界拳王都一样,中国职业拳击刚刚起步,最好别脱离国际惯例,做所谓中国特色。而WBO等拳击组织为打开中国市场,也有可能将其变成一场变味的金钱生意,而最终在舆论捧高或贬杀中受伤的是拳手。”

当曲鹏在台上挥拳时,彭定贵穿着单薄的黑色T恤,背着一个红色的双肩包准备进场观赛,但没有出示证件的他被安保人员拦下,即便刚刚才在这个拳台上流汗,但3个回合的“梦”还不足以让别人记住他的长相,况且,那条皱皱的缠手布在拳台以外光线暗淡的地方,始终难以被发现。

本报北京5月6日电

多个赛季积累有收获,两个小组第一很提气——

亚冠联赛不再是中超球队的“鬼门关”

本报记者 郭剑

富力被淘汰,鲁能生死未卜,亚冠联赛小组赛最后一轮,所有戏剧性场面都迎来落幕结局:在理论上还有可能被淘汰的北京国安,客场艰难打平K联赛球队水原三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昂首出线;广州恒大虽然在主场大雨中以0:2负于悉尼流浪者队,但其积分早已保证球队出线——无论鲁能能否在客场面对全北现代时翻盘,京广两支球队都以小组第一晋级亚冠联赛16强,中超球队逐渐在亚洲范围内找到了前进的轨道。

“去年这个时候,国安队没能进入淘

汰赛阶段,所以今年球队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小组赛出线,全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此过程中克服了很多困难,这说明球队确实是在进步。”国安主帅萨诺说,“无论北京足球队还是中国的其他足球队,在亚冠小组赛中拿到第一都值得骄傲。我们从来都没拿到过这么多积分,球队创造了新的纪录。我们现在伤病满营,急需让球员尽快恢复和调整,以便在淘汰赛阶段创造更新的纪录。”

不过,水原三星队主教练徐正源对北京国安取得小组第一很不满意,他在小组赛赛后表示,水原三星与国安的主场较量采用了轮换阵容,多名主力没有登场,

而且比赛中得分的机会多于客场,没能更多地进球他感到“非常遗憾”,“我们分析了此前在客场输给国安的比赛,那场比赛我们被罚下了一名球员,但全队发挥得还不错,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能战胜对手。”

尽管徐正源的不满并不出人意料,毕竟北京国安前三轮高积9分而后三轮只有3分,最终水原三星只是因为胜负关系屈居国安之后,但近年来北京国安在亚冠赛场上的表现,已经画出了一条慢慢上扬的曲线。

2008、2009两个赛季,北京国安交出3:5不敌东京银行和小组倒数第一的不光

彩答卷;2010赛季,国安小组出线后遭水原三星淘汰;2012赛季,北京国安重蹈位列小组倒数第一的覆辙,当年3平3负战绩至今还是国安球迷不愿揭开的伤疤;2013赛季,北京国安小组出线,但被首尔FC逆转而止步16强;2014赛季,北京国安小组赛末轮未能战胜首尔FC而未能小组出线——此前北京国安征战亚冠联赛的这6个赛季,只有两次小组出线,从未打进过8强,因此,本赛季国安能在小组赛中“涉险过关”,前面多个赛季经验的积累不可或缺。

广州恒大同样如此。无论国内赛场抑或亚冠赛场,广州恒大较之两个赛季之前

的巅峰期,已经失去了统治能力,但连续多年的亚冠征战经验以及俱乐部管理层不间断的投入,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竞技状态——前3轮便积9分,使得恒大提前出线。

在东亚区已经出线的4支球队中,K联赛与中超联赛各有两支球队,算是平分秋色,这是当今亚洲足球赛场各国联赛实力不断倾斜的标志——日本J联赛整体不差,但其高端实力不足,浦和红钻和鹿岛鹿角均在小组赛垫底,4支球队只有柏太阳神出线,大阪钢巴则要在最后一轮和城南FC死磕才有出线可能。

因此,对于中超球队越来越熟悉的亚冠赛场,多家俱乐部已经确定了更进一步的目标。据记者了解,广州恒大、北京国安和山东鲁能等亚冠常客,对诸多客场已不陌生,甚至在备战阶段能够得到不亚于主队的便利条件,这也是中超豪门在积累了多年亚冠经验之后,正逐步改变“惨案当事人”孱弱形象的最好证明。

本报北京5月6日电



5月6日,在欧冠半决赛首回合较量中,尤文图斯主场以2:1战胜皇家马德里。CFP供图

彭水再办第五届中国摩托艇联赛首战赛事

本报讯(记者林冈)5月26日~28日,第五届中国摩托艇联赛“太极水”杯重庆彭水大奖赛,将在重庆市彭水县隆重举行,这也是彭水第五次举办这项赛事的首场比赛。

赛事设职业、专业和业余三个组,放开了参赛限制并提高了奖金额度。赛事分为中国方程式竞速赛、立式竞速赛、立式竞速赛和水上飞人赛。为体现选手的驾驶水平,使比赛更加公开、公正、公平,规定同一等级的器械一同竞技。

天价赔偿案启示中国体育用品企业

本报记者 慈鑫

广州中院近日一审宣判著名运动品牌“NEW BALANCE”的销售商——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百伦公司)赔偿广东鞋企老板周某伦9800万元,因为新百伦公司侵犯了周某伦享有的“新百伦”商标权。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引起舆论的关注,以中国公众的认知而言,“新百伦”无疑是“NEW BALANCE”这个美国著名运动品牌的中文名,绝少有人知道“新百伦”商标的真正拥有者是广东的一位鞋企老板。

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傍大牌”的创业和发展模式不在少数,但可能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在周某伦起诉新百伦公司的案件中,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却是新百伦公司向周某伦支付9800万元的天价赔偿金。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上海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振宏给出了专业的解释,“中国法律对商标的保护采用的是注册制,即谁先注册,谁享有商标的拥有权。但在美国,法律对商标的保护采取的是使用制,即谁先使用该商标,谁获得商标的拥有权。”

抢注国外知名品牌中文商标的情况在国内屡见不鲜,不过,周某伦申请“新百伦”商标并不属于抢注。

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中院查明,2004年4月,广州商人周某伦通过转让获得了一个叫“百伦”的服装、鞋帽类商标。周某伦称,后来由于业务发展需要,他又设计了一个叫“新百伦”的商标,并于2004年6月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在新商标注册过程中,美国运动鞋公司(NEW BALANCE)在中国的代理生产商“新平衡运动鞋公司”,于2007年向国家工商总局提出异议。

该公司认为,周某伦的“新百伦”商标抄袭、模仿了NEW BALANCE,要求工商总局驳回其商标注册申请。2011年7月18日,国家工商总局作出裁定,认为该公司异议的理由不成立,周某伦申请的“新百伦”商标予以核准注册。

这说明,新百伦公司在明知“新百伦”商标已经被他人合法注册的情况下,仍坚持使用该商标。

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徐认为,本案的商标混淆与传统商标法所指的混淆恰恰相反,属于反向混淆,一般发生于原告注册商标比被告的商标知名

度低时。这种反向混淆会显著削弱原告利用涉案商标建立商业声誉和开拓市场的目的,导致原告注册商标的识别力被扭曲或遮蔽。如果不制止,就会使知名企业在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时毫无顾忌,从而发生弱肉强食的不公平竞争后果。

因此,法院裁定新百伦公司一审败诉。

不过,在中国体育用品行业,“土品牌”傍“洋品牌”的情况却是司空见惯,因此引发的案件也不少。最著名的案件当属阿迪达斯起诉阿迪王,迈克尔·乔丹起诉乔丹体育。

不过,阿迪达斯最终花重金买下了阿迪王的商标,迈克尔·乔丹起诉乔丹体育的前景也不被业界看好。“这些案件无论结果怎样,对中国的体育用品都是一个提醒。”体育营销专家、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张庆向记者表示,“中国体育用品企业需要从‘中国制造’提升到‘中国创造’。虽然‘傍大牌’对企业创建初期的业务发展有利,但相关案件的发生也说明,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品牌的建立、维护和提升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傍大牌’迟早会带来麻烦。”

本报北京5月6日电

把所有选秀球员年薪定在30万人民币以下有悖市场规律——

CBA选秀是规范市场不是限制市场

本报记者 杨

“选秀制度本身,是适于联赛发展的,但从CBA联赛目前的情况看,把所有选秀球员的年薪都限制在30万人民币以下,显然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某篮球经纪人对记者说。

在日前结束的CBA联赛委员会会议上,出台了若干关于2015~2016赛季的新政,其中颇受关注的,就是中国篮协拟在今年夏天推出选秀制度。根据CBA联赛办公室相关负责人的解释,港澳台球员、大学生球员将是参加选秀的主体,他还公布了相关选秀的细则。

应该说,相关细则大部分是正确的,而且有利于规范整个选秀过程。比如,参加选秀的球员必须年满18周岁,大学生球员必须参加过CUBA或大超联赛,港澳台球员则必须参加过本地区最高水平的联赛。各俱乐部有两轮选秀的机会,选秀采取“倒摘牌”制度,被选中的球员如拒绝和球队签约,两年内不得参加CBA联赛等。但对选秀球员年薪的规定,似乎和联赛的发展并不匹配。

根据CBA联赛办公室的解释,参加选秀球员的保障工资的上限,也就是“状元秀”的薪水,为30万人民币,其他顺位的选秀球员的薪金,按从高到低递减。“这个规定显然有些‘一刀切’。”该经纪人说,“我觉得应该把大学生球员和港澳台球员,特别是台湾球员区别对待,因为两个群体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从1999年台湾球员郑志龙加盟上海男篮开始,CBA联赛的赛场始终不乏宝岛球员的身影。特别是2012~2013赛季,在CBA效力的台湾球员达7人之多,林志杰和李学林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根据媒体的报道,有“野兽”之称的林志杰,在浙江队的年薪约250万人民币,上赛季未能和北京男篮续约成功的李学林,合约要价也达到了70万美元。

“据我了解,所有在CBA效力的台湾球员,年薪没有低于100万人民币的,现在‘状元秀’的年薪只有30万人民币,显然不符合市场规律。”该经纪人说。

确实,和大学生球员以及水平相对较低的香港、澳门球员相比,台湾球员不仅水平更高,而且还在亚洲赛场取得好成绩的经历,如此低的薪金,大大降低了CBA联赛的吸引力。“在台北市中心,一平方米的房子也要10万人民币,一年的薪水只够买3平方米,台湾球员怎么会来?”

CBA联赛目前是亚洲最有影响力,水平最高的联赛,包括港澳台球员在内的所有非大陆球员,来CBA联赛打球的目的,无外乎是对更高水平比赛的追求和对经济利益的考量。但现在人为地做了不符合市场规律的限制,显然影响了CBA联赛的整体形象,也不利于缩小联赛各球队之间的差距。

也正因此,许多业内人士认为,虽然有关选秀球员年薪不超过30万人民币的政策,看起来是出自CBA联赛委员会的决议,但实际上更像是中国篮协的决策,而非出自俱乐部的意愿。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一方面,中国篮球在亚洲赛场优势不再,特别是菲律宾亚洲杯,中国男篮输给中华台北队后,让“CBA培养对手”的说法愈演愈烈。30万年薪的政策,无异于将CBA敞开的大门向反方向重重地推了一把。另一方面,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说,不论你是想夺冠还是想进季后赛,30万年薪的政策,都意味着将增强实力的捷径堵死,这显然有损自身利益。

“选秀制度本身是合理的,但CBA不是NBA,很多问题要区别对待。”该经纪人说,“对于大学生球员来说,选秀是获得一个工作的机会,30万年薪可能比较合适。但对于高水平的台湾球员来说,来CBA打球则是机遇,他们渴望的就是高水平比赛和好的工资待遇,从这个角度上说,设定一个合理的、符合市场规律的工资区间,让参加选秀的球员和俱乐部自行商谈,可能更合适,而不是限定一个数额。否则,即使俱乐部表面上遵守30万元的限制规定,但为了吸引优秀球员加盟,也会导致‘阴阳合同’泛滥,反而对规范市场更为不利。”

本报北京5月6日电



5月6日,在NBA西部半决赛,勇士以90:97不敌灰熊。CFP供图